

编者按：告别2016年，悄然，我们又时光的沙灘上踩了一个脚印。意外连连，2016年在世界经济低速增长中划上句号。迷雾重重，2017年世界经济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期许？

2017年世界经济五大变量值得您关注。

2017年，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将开启新一轮政治周期。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将以何种方式治理美国经济？IMF前副总裁朱民日前说，目前市场不清楚特朗普将如何实施刺激经济方案，这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2016年，美国经济向好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引发美元汇率上扬，搅动全球市场。这令人再度想起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的那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如果说，英国公投“脱欧”引爆了2016年欧洲政治格局的新裂变，2017年，预计会有更多政治不确定性考验欧洲的一体化，并对世界经济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冲击。

在近年来的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新兴经济体一直扮演关键角色，但同时新兴经济体也面临增速下行的挑战。关于新兴经济体风光不再的言论时有出现。

事实上，新兴经济体的整体稳健势头并未改变，依然是世界经济中的亮丽板块。

在欧美一些国家“逆全球化”风潮加剧的情况下，全球化共识正遭遇挑战，面临滞步的风险。涉及12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可能被弃，而英国脱离欧盟将导致双方贸易及投资关系受损。

尽管如此，2016年，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记录了一些令人振奋的大事，尤其是二十国集团峰会在杭州召开，为世界经济合作擘画了新的蓝图。

新的一年，在世界经济的裂变与融合中，全球经济治理谁引领、谁主导、谁设计规则、谁来仲裁，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博弈张力将更加紧张。如何做到张而不崩，保持韧劲与弹力，将考验各方智慧。

当然，无论世界如何动荡不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先要将国内的经济搞好，发展是道理。

2017年，国内宏观经济仍有下行压力，但供给侧改革的积极效应也会开始显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十三五”主线，其相关政策在2017年会作出适当调整和完善。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降成本”五大着力点之中，2017年的改革将更为侧重“去杠杆”，货币政策着力“防风险”，财政政策发力更精准。央企兼并重组将成为2017年国企改革的重头戏。

回顾过去的五年，受困于需求端90后出生人口，尤其是1991年的“断崖式下跌”，廉价日用品的消费萎缩让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阶段。2017年，中国经济将开始绝地反击。

本期推出“2017前瞻”专题，供您决策时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本期专题·2017 前瞻

- 02 前瞻 2017 世界经济五大变量
- 04 2017 年中国经济前瞻：这个将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 07 前瞻 2017，中国经济绝地反攻

政坛经纬

- 12 “为什么没有人对李亿龙说不”
衡阳样本：三任市委书记连续落马

经济纵横

- 15 “双创”是经济转型最大的新动能

文化漫步

- 18 “工匠精神”何以成为年度流行语

历史深处

- 19 古代如何考察官德

悦读时光

- 封三 “你办事，我放心”的若干史实（六）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前瞻 2017 世界经济五大变量

意外连连,2016 年在世界经济低速增长中步入尾声。迷雾重重,2017 年世界经济如何发展,让人期待。

种种不确定性之中,有一点为大多数专家所认同:世界经济低增长、低贸易、低投资和低利率的状况在新的一年里难有根本改观。

综合来看,至少有五大关键变量将对新一年世界经济的形与势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变量一:“特朗普新政”啥真容?

2017 年,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将开启新一轮政治周期。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将以何种方式治理美国经济,各方都在密切关注。

IMF 前副总裁朱民日前说,目前市场不清楚特朗普将如何实施刺激经济方案,这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金融危机后经过 8 年多休整,美国经济就业、赤字和增速三大指标都已明显改善,失业率已降至 4.6%的健康水平;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0%的峰值降至 3.2%;今年第三季度美国 GDP 年化增长率为 3.5%,IMF 预计美国经济 2017 年全年增长 2.2%,这在发达经济体阵营中算得上抢眼。

但以减税、基础设施建设和贸易保护为三大政

策重点的“特朗普经济学”具体内容如何还有待观察,对美国经济的利弊还需时间检验。特朗普政治资本积累尚需时间,而且减税和基建投资都面临中期财政可持续性的现实考验。

不仅如此,排他性的贸易保护倾向往往会损人不利己。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指出,保护主义、储蓄不足与赤字开支组合在一起会成为“一杯格外有害的鸡尾酒”。

201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奥利弗·哈特近日表示,特朗普的经济计划令人担忧,他威胁退出贸易协定并可能开启保护主义时代,最终将不利于世界经济。

关键变量二:美元迷思如何解?

2016 年,美国经济向好和美联储加息预期引发美元汇率上扬,搅动全球市场。这令人再度想起美国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的那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美联储 12 月中旬进行了本轮加息周期的第二次加息,目前市场预期明年美联储可能加息 3 次。

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小步回归正常,全球货币金融市场新周期到来。美元走强令非美元货币集体承压。统计显示,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货币,美元目

前比 2011 年的低点升值 40%，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至 2008 年以来最低水平。亚洲其他货币对美元的跌幅也是 1997 年至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所未见。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认为，美国作为贸易强国的相对影响力在逐步下降，但美元作为交易和储值货币的优势地位依然如故。2014 年的一项估算显示，全球随美元浮动的货币仍覆盖世界 60% 的人口和 60% 的经济规模。

国际清算银行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 2015 年年底，美国以外的各国政府和企业共发行了近 10 万亿美元计价的债券，其中约三分之一来自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当美元升值时，偿还这些债务的成本随之增加。

由于美元作为贸易、金融和储备货币的地位仍很牢固，美元汇率走向对全球贸易以及金融和信贷市场有着深远影响。当然，强势美元对美国经济自身也并非全是福音，也可能带来挤压出口和贸易赤字扩大等负效应。

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经济复苏将造成利率与通胀交错回升之路，而强势美元可能给新兴经济体带来本币贬值、资本外流、偿债负担加重等多重挑战。而且美元是大宗商品计价货币，美元持续升值可能导致过去一年低位反弹的大宗商品价格再度承压。

可以说，美国货币政策路径是 2017 年全球经济一项重大外部性风险。也正因为如此，美联储政策的外部性犹需明辨，美联储在加息时不应忽视其全球责任。

关键变量三：欧洲政经再裂变？

如果说，英国公投“脱欧”引爆了 2016 年欧洲政治格局的新裂变，2017 年，预计会有更多政治不确定性考验欧洲的一体化，并对世界经济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冲击。

未来 12 个月里，欧洲一些主要经济体如荷兰、法国和德国将举行大选，意大利大选也可能提前至

2017 年举行。此外，英国公投决定“脱欧”至今已近半年，清晰的“脱欧路线图”依然缺失。如何正式启动退欧程序，不仅将再度考验英镑汇率，也将考验欧洲经济的整体健康。

巨大不确定性笼罩下，作为欧洲经济“领头羊”的英国，未来几年的增长路线已被打乱，财政状况恶化、甚至有陷入衰退之虞。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形象一再受损，债务危机不断，欧洲经济一体化不断出现内伤。银行联盟、财政联盟等一系列助力一体化的机制恐怕会被搁置。内部的乱局也可能导致欧洲经济的对外保护主义增加，从欧盟最近采取的一些对外贸易保护举措即可见端倪。

焦虑在世界人民心头升起，欧洲的政治周期是否会与全球金融和经济周期发生共振，哪些新的“黑天鹅”仍在路上？

关键变量四：新兴经济体能稳住？

在近年来的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新兴经济体一直扮演关键角色，但同时新兴经济体也面临增速下行的挑战。关于新兴经济体风光不再的言论时有出现。

事实上，新兴经济体的整体稳健势头并未改变，依然是世界经济中的亮丽板块。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然保持稳健，且政策可预期性强。保持中高速增长，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把握航舵，稳中求变。无论是就业，还是经济结构调整，一年来都交出了令人振奋的答卷。

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说，尽管经济增长放缓，但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大贡献者，在全球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背景下，这样的贡献尤为重要。如果中国经济 2016 年实现 6.7% 的增长，将为全球经济整体增长贡献 1.2 个百分点。

尽管面临美联储加息带来的货币贬值压力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挑战，新兴（下转第 6 页）

2017 年中国经济前瞻： 这个将是改革的重中之重



11 月出口和进口双双正增长，释放出进出口回稳向好的积极信号，也再度印证了当前我国经济筑底迹象显现。

专家认为，明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继续深入推进、释放红利，去杠杆将成为重中之重。货币政策方面，稳健货币政策将延续更加注重降杠杆、防风险和稳汇率的思路；财政政策方面，明年积极财政政策在保持一定赤字率水平支持进一步减税降费的基础上，将会更加侧重稳中有进、精准发力，更

加凸显“结构性”特征。

改革 供给侧或突出“去杠杆”

2017 年国内宏观经济仍有下行压力，但供给侧改革的积极效应也会开始显现。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宏观研究主管谢亚轩指出，积极效应显现将表现在：去产能改善供需关系，工业部门走出通缩，企业盈利持续改善，提振制造业投资信心；去库存大幅降低房地产市场存销比，提升地产商补库存冲动，缓解限购政策对地产投资的负面影响；去杠杆推动货币政策更趋稳健，抑制资产价格泡沫，推动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缓解高货币存量下的资产荒现象。

业内人士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十三五”主线，其相关政策将在明年作出适当调整和完善。而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降成本”五大着力点之中，明年的改革将更为侧重“去杠杆”。

天风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孙彬彬表示，当前非金融企业杠杆接近极限，无论从债务杠杆率的角度，还是资产负债率的角度，非金融企业部门从 2008 年之后持续加杠杆，杠杆水平明显偏高；而且

从全球的横向对比来看,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宏观债务杠杆水平全球最高。公共部门补贴仍然支撑投资和延续过剩。

在他看来,要破解困局,需利用供给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补短板、降成本。“供给侧改革政策推出的一个大背景就是当前我国的外需已没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只能靠内部需求来挖掘。而目前我国内部需求的挖掘又存在三个主要的压力,一是高杠杆压力,二是产能过剩严重的压力,三是货币压力。因此,预计2017年的重点将落在去杠杆上,而去杠杆的三个方式是减分子、债转股和加分母。”他说。

中企之声研究院院长李锦也认为,今年主要是在去产能、去库存方面推进,预计明年将加大去杠杆力度。他表示,明年政策在债转股方面可能会有较大突破,也会有更多市场化办法出台。预计将有更多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到债务重整进程中。

稳健 货币政策着力“防风险”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8日发布的报告称,2016年,货币政策继续坚持稳健的基本取向,更加注重为供给侧改革创造稳定的融资环境,以推动实体经济温和降杠杆,货币信贷稳定增长。估计2016年全年M2增长11.8%,低于年初13%的增长目标,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约13%,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近12万亿元。

央行发布的《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延续了此前“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灵活适度,适时预调微调”的表述,但在谈及下一阶段货币政策时也首次强调,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同时,注重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业内人士也表示,这种表述的变化,体现了在为供给侧改革营造更好的宏观环境方面,货币政策将更为注重“防风险”。

中行报告称,2017年国内外环境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货币市场的扰动因素较多,预计资金

价格将窄幅波动,流动性或延续阶段性的紧平衡态势。“为应对债市高杠杆、资产价格泡沫化等问题,货币政策将延续更加注重降杠杆、防风险和稳汇率的思路。近期中长端利率抬升,显示市场对未来流动性预期更趋谨慎。”报告称。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货币政策未来会朝着适度收紧或“紧平衡”方向去运行,但是由于存在一些不利因素的压力,收紧的力度不能过大。他表示,2017年,全球市场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货币政策操作也将面临不小挑战,比如如何把握收敛的时机和幅度,如何避免境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等。

中行报告称,随着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和期限品种的丰富,其预调微调能力不断提升。同时,央行与市场的沟通日益加强,货币政策意图的透明度不断提高,稳定市场预期能力也在逐步增强。随着利率走廊机制的加快探索和完善,相关部门的利率调控能力将不断增强,预计短期利率波动可以得到更好地控制,不会出现太大幅度的冲击。

积极 财政政策发力更精准

专家认为,明年积极财政政策在保持一定赤字率水平支持进一步减税降费的基础上,将会更加侧重稳中有进、精准发力,更加凸显“结构性”特征。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财政赤字率仍有一定提升空间,这是扩大支出和减税降费的基础。减税除了继续进行增值税改革外,企业所得税上也应下功夫,充分体现政府和企业共渡难关的要求。支出方面应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大研发投入,夯实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个人所得税综合与分类改革加快,突出专项扣除,让个税减税更有效。他还表示,财政政策的实施应有国际视野。当前国际财税竞争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尤其是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种种可能必须有

充分的应对措施。

“明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是精准发力，在去年的基础上稳中有进、稳中提质。”财政部内部控制委员会委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减税降费、保持一定的赤字率是必要的，但考虑到财政收入承受能力等因素，一味依赖提高赤字也是不可持续的。应更加注重优化支出结构、提高强化资金统筹、减少沉睡资金和绩效不高的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把钱用在刀刃上。在支出结构上，要更加注重需求潜力释放，提高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比如养老、旅游、文化、体育等消费性需求方面，补民生短板，调动民间资本活力，为稳增长适度扩大需求。

在他看来，防风险会是明年财政工作的重点之一。“比如地方债，今年地方债有了全面的路线图

和任务书，下一步就是要疏堵结合。还要特别注意局部地区、重点领域的财政金融风险。”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认为，要从总量性的财政政策，转向积极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在兼顾总需求的同时，把目标放在结构性改革和公平性竞争方面，减少不利于结构调整和市场公平竞争支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他同时表示，营改增的减税效果尚未完全发挥出来，还有减税空间。今后需结合税制改革对现有的营改增税率进行调整。

中信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诸建芳认为，2017年财政政策仍将积极，赤字率进一步提高，赤字规模扩大，财政支出将出现压缩非刚性支出、向薄弱环节倾斜及通过基建投资支撑经济增长的“三足并重”局面。

（《经济参考报》记者孙詔华 张莫）

（上接第3页）经济体的整体势头在回升，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也有所增强。经历过以往危机的磨练，新兴经济体有了更多在低谷中艰难爬升的韧性、在困境中谋转型的动力和用改革寻求突破的紧迫感。

IMF 的预测显示，许多新兴经济体 2017 年将实现增长，而非徘徊不前。明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将从今年的 4.2% 升至 4.6%。近几年遭遇寒流的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均在触底回升，预计明年增速都将由负转正，分别实现 1.1% 和 0.5% 的增长；印度经济明年增速预计将升至 7.6%。

关键变量五：全球经济治理谁引领？

在欧美一些国家“逆全球化”风潮加剧的情况下，全球化共识正遭遇挑战，面临滞步的风险。涉及 12 个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可能被弃，而英国脱离欧盟将导致双方贸易及投资关系受损。

尽管如此，2016 年，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记

录了一些令人振奋的大事，尤其是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为世界经济合作擘画了新的蓝图。

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表现日益受到瞩目。

美国石英财经网站发表题为《中国正在成为推动全球化的最强力量》的文章说，当西方欲从全球化“回撤”的时候，中国希望让全球化继续高歌猛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说，在预期的新一轮全球化大潮中，中国应该也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引领作用，同时成为推动者和规则制定者。

新的一年，在世界经济的裂变与融合中，全球经济治理谁引领、谁主导、谁设计规则、谁来仲裁，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博弈张力将更加紧张。如何做到张而不崩，保持韧劲与弹力，将考验各方智慧。

（12月26日 新华社 记者樊宇、刘丽娜）

前瞻 2017, 中国经济绝地反攻

2017 年, 中国经济即将迎来最后一跌, 就是所谓的“绝地”。

原因来自需求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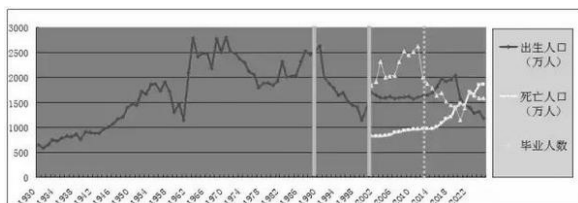
房地产及其上下游的庞大产业链, 仍然是中国的第一支柱, 而这个支柱的需求来源, 就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青年人口。

2015 年, 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56.1%, 按照近年来每年增加 1-1.5 个百分点的增速, 到 2017 年将来到 58-60% 的区间了, 天花板越来越近, 从农村里流入的人口渐渐枯竭。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众所周知的“90 后人口塌陷”。1990 年, 中国出生人口 2620 万人, 十年后的 1999 年, 中国出生人口 1150 万人, 这十年间, 中国出生人口下降了 44%, 接近一半, 直接造成了各行业针对 90 后消费的需求萎靡。

这十年的出生人口缩减, 对中国的经济冲击, 从 2012 年开始释放, 因为那一年, 90 后们陆陆续续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了, 开始领取工资, 成为内需市场的接力棒了。那一年, 成为了中国经济难忘的一年, 直接的反应就是 A 股, 漫漫熊市跌到了 2000 点以下的谷底。

事实上, 这十年的人口塌陷中, 最关键的一年, 就是 1991 年。因为从 1990 年的 2620 万人到 1999 年的 1150 万人, 并不是一条直线的下滑。其中 1991 年的出生人口 2000 万人, 下降 620 万人, 占了 90 年代总下降人口数的 42%。



接近 90 后人口塌陷总数的一半比例! 咬牙挺过这一关, 后面的都是微风细雨了。

2017 年正是这最难过的一关, 决定国运的咽喉。因为房地产的平均购房年龄是 27 岁, 不信你查一查, 所有研究报告都是这么说的。也就是说, 1991 年出生的小朋友们, 在经历了毕业后吃方便面、买廉价化妆品和手机的消费之后, 终于进入到结婚购房的阶段了。

2017 年的中国房地产需求, 即将迎来最严重的一次萎缩。这次的冲击, 将比那些廉价消费品的冲击力要大得多, 因为房子的背后, 是钢铁、煤炭、电力、卡车、工程机械、家电、家具、建筑业、装饰业……几乎涉及国计民生的每一个行业。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绝地。

但这又是一场可预见的绝地,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 我们已经足足做了四年的准备。

我们不能控制需求, 但我们可以调整供给。

这就是所谓的供给侧改革, 只有压缩多余产能, 全力转向新经济, 瘦身成功了, 才有足够的力气跳过巨坑。

先说旧经济

产能过剩行业的压缩进度完全超出预期, 年初上面制定的钢铁去产能 4500 万吨, 煤炭去产能 2.5 亿吨, 11 月份陆续完成, 直接导致三季度钢铁和煤炭价格的大幅回暖, 全行业恢复盈利, 甚至出现了“煤超疯”的现象。

即使在这种背景下, 最新的发改委表态仍然是, 2017 年压减产能将不少于 2016 年。

也正是在这种强有力的执行下, 我们看到, 高层对于产能过剩的担忧已经逐渐消弭, 国有媒体上关于类似问题的提及逐渐减少。

最值得松了一口气的数据，就是从 2012 年开始逐年攀升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 2016 年中开始，终于缓缓下降了。这是病人手术见效的最清晰指标。



这就是为什么，最近高层的政策重点，开始转向新的方向了。

首先是区域政策重心的转移

如果说前两年的重点，是自贸区，是抓沿海地区的上海、深圳，那么明年的重心，将是“中部崛起”。媒体标题是这么说的，“国务院五大重点任务促进中部崛起，探索产业转移新模式”。

浦东自贸区、前海自贸区，关注点是“创新”；中部崛起，关注点是“产业转移”，其中两个龙头是湖北与河南。湖北是九省通衢，有长江和京广高铁贯通，河南是中原腹地，有郑州“国际物流分拨中心”的御赐令牌，未来数年将会成为太阳升起的地方。

为什么要转移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沿海地区的新经济已经起来了，需要向内陆辐射。

产业转移我们已经很熟悉，早在六七年前就经历过一波，不过那是富士康、家电服饰们的故事。比如内陆省份山西，在我们记忆里是一个只会挖煤的黑土地，数年的产业转移之后，亮瞎人眼球的是，今年山西出口的最大大宗商品竟然是手机，他们占据了山西出口总值的超过一半比例。

如果新经济，也能够像这些制造业一样转进内陆生根发芽，那么中国经济的未来就没什么好担忧的了。至于如何转，明年且看高层的出牌。

接着是国企改革

国企的规模庞大、臃肿低效，是个老大难问题

了，80年代讲“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故事，90年代讲“政企分开、抓大放小”的故事，2000年代讲“股份改革、上市融资”的故事，每一步，都是在时代洪流的推动下踉跄前行。

接下来，究竟如何改革才能进一步提升效率呢？这一轮的故事，叫做“混合制改革”。简而言之，就是从上一个十年的，上市引入“散户”，变成引入有更大话语权的“民间资本”。这些民间资本，通常都是业内龙头，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韩国，就是三星、现代的级别，放在日本，就是索尼、丰田的级别。

小散户无法推动的改革，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民资龙头的压力下，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精彩。

第一批被拿出来试点的，有联通、东方航空、南方电网、哈电集团、中国核建、中国船舶。据传闻，BAT 入股联通已经谈的差不多了，只差最后的审批流程。联通这么多年来一直被中移动压着打，即使拿到 3G 的好牌也没什么起色，这一剂强心针打下去，两个马爸爸天天踢屁股，不知道能够起到什么化学反应呢，真的很好奇。

资本市场的改革同样不能忽视

我国 A 股有一项艰巨的使命，就是在整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大环境下，呵护传统制造业的根基。这就是为什么，注册制迟迟无法落实，国家队频繁入市的原因。尤其是最近几年，市场资金不断从旧经济向新经济板块转移的过程中，旧经济里的优质企业同样被极度看空。

必须把资金留住，让旧经济拥有足够的血液和食物来安全过冬。

于是险资入市的战略被启动了，2012 年，险资投资从审批制改为注册制，2013 年寿险利率放开，2014 年推动万能险创新。这一系列的新政，在随后的三年间推动了保险理财市场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存款从低利率的银行里，搬到更高利率的保险理财产品中。

险资有钱之后，就开始大规模的进入 A 股市场了。在高层的设想中，险资作为机构投资者，相



比散户拥有着更理性的决策意识,一般而言,他们更追求长期的财务回报,因此对股息率高、业绩稳定的旧经济龙头相对偏爱。这是为旧经济保暖的一剂良药。

意外的是,几个乡里来的野蛮人坏了一锅好汤,快进快出、打砸抢兴风作浪,万科也就罢了,居然连格力这样的中国制造样板都想上,实在是不识好歹。于是一番收拾,前海人寿、恒大人寿纷纷被监禁,打歪的方向盘重新被扶正。

金融上通过险资供血,制度上引入民营基因,地域上嫁接新经济种子,这一切都是 2017 年确保中国经济不在绝地沉沦的手段。

熬过绝地,就意味着春天的到来,而春天需要新经济的茁壮成长。2017 年的中国新经济,是否拥有足够的体量和活力,来将中国经济拉出悬崖深坑?

纵观发达国家的经济,支柱无非是金融、商业、文化、能源、交通、制造六大块,让我们逐一考察一下,看看这五年来,互联网和智能 IT 技术的结合,是如何深入的渗透到了中国经济的骨髓里,他们在接下来的 2017 年,又将带给中国什么新的变化。

金融

中国是全球第一个完成了移动支付革命的国家。据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发布的《2016 中国电子银行调查报告》,在 2015 年,中国人在转账汇款方面,最经常使用个人网上银行的份额是 35%,到 2016 年则大幅下跌至 19%,取代他们的则是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其中支付宝的最经常使用用户份额从 2015 年的 35%增至 2016 年的近 50%,

使用过微信进行转账汇款的用户比例也跳升至 56%。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国内的渗透率战争已经结束,重点转向了全球的革命输出。

比如支付宝,其宣称目前已经覆盖了全球 70 个国家,北到芬兰,南到新西兰,都可以享受支付宝的线下商家服务。用户在海外打开支付宝,“口碑”“滴滴打车”“民宿”等入口都会自动变成 discovery、Uber 和 Airbnb,寻找周边美食、领优惠券、打车、订房间,畅通无阻。

而微信支付,则通过和星巴克、麦当劳这样的连锁商家捆绑,逐步打开海外的使用场景。虽然目前动作小于支付宝,但后劲十足。以国内市场为例,支付宝与腾讯财付通的市场份额之比,已经从 2015 年的 68:20,转为今年第二季度的 55:32。

微信支付有这样的后劲,和他在阿里电商体系之外,创造了另一个全新的社群虚拟经济有着密切关系。这个生态包括娱乐需求的游戏、信息需求的公众号、个性化购物需求的微店电商、金融需求的理财产品、红包转账和支付,还有接下来的小程序工具,搭积木一样垒出了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虚拟经济。

金融是经济之母,金融效率的提高对新经济的推动不言而喻,当中国成为移动金融革命的输出地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微妙的变化。

商业

中国的电商革命已经进入收尾阶段,O2O 也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故事叫做“新零售”。

上月,阿里宣布入股线下零售商三江购物,此后该股连续收获了十几个涨停板,带动整个零售商业板块的价值重估。线下零售被电商欺负太久了,很久没有如此的扬眉吐气过。其实阿里以前也入股过一些线下公司,比如苏宁和银泰,但市场对此的热情远远不及。

原因就在于,时移势易。今天的电商获客成本,已经比线下更高了,意味着天花板已到,进一步的升级只能是打通线上与线下,创造出新的商业形态。

刚好亚马逊与阿里，都在同步探索新零售革命，我们看看彼此的差异在哪。

前一阵，亚马逊发布了一个叫 Amazon Go 的视频，给我们描绘了他们想要创造的购物场景：人们走进亚马逊的实体店，无须排队、无须收银，拿到商品就可以离开，随后在手机 App 之中进行支付。其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压缩人力成本，让售货员下岗。

而阿里的试验场则是今年 9 月开业的“素型生活”，这家店的特色在于，首先通过大数据进行用户画像，将目标用户喜欢的服饰、家居、数码产品、文化商品进行跨界混搭，然后度身订造一个用户乐意去体验的购物场景，比如森林、幻想世界等，最后通过二维码可以进入网上商店，对比价格与类似商品，下单后送货到家。

简而言之，亚马逊做的是减法，阿里做的是加法，一个为了降成本，一个为了创造新的购物体验。这种分化，就跟西方电商追求页面的简洁，中国的电商追求商品的丰富和服务的亲切是一以贯之的。

过去的十几年，他们开创的线上零售模式，让商品的流通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他们决定从线上回到线下，按照互联网的理念来创造新零售物种的时候，一场新的资本狂欢注定要开启。这是一个比电商、O2O 还要大数倍的天地。

对于中国的新经济而言，缺的不是资本，而是想象力。

文化

文化是生产力，但同时也是由技术平台驱动的。

欧洲诞生的印刷机催生了书籍、杂志和报纸文化的繁荣，美国诞生的放映机、电视机和留声机让电影、电视和音乐工业得以茁壮，日本电视工业的崛起孕育了动画行业的发达，网络游戏则最早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早熟的韩国诞生。

中国的文化产业落后，不是创作者不行，仅仅是因为旧技术平台的落伍和掣肘。但是这一现象在最近两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许多年之后，人们

回过头来看，将会意识到 2013 年的重要性。

2013 年，中国发布了一个叫“宽带中国”的战略，此后投资在光纤网络和 4G 移动通信设施上的资金成倍增长，每年在 4000 亿元左右。按照规划，到 2017 年，中国所有城镇家庭都将获得 100M 光纤的接入能力，80% 的农村覆盖光纤，4G 移动通信实现全面覆盖。

这个政策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移动视频和直播的繁荣。在美国，移动直播还是一种先锋文化，但在中国，这已经是超过一半网民使用过的主流文化了。甚至你难以想象的是，一款针对农村用户的移动视频 APP 快手，其注册量已经超过了 3 亿人。

网红、IP 人格化，这些新时代的名词或许过几年就会被人淡忘了，但是新文化的火种已经被点燃。现在的创业者们，也越来越开始流行一种新的“C2A”创业模式，将中国(china)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向海外(abroad)拷贝，比如中东版的今日头条，印尼版的快手，韩国版的美图，屡见不鲜。

能源

中国是全球对新能源补贴政策最坚定的国家之一，十年以前，高昂的新能源补贴成本让媒体质疑声一片。

但是任谁都无法预料到科技的进步是如此迅猛，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2008 年至 2015 年全球地面光伏电站的度电平准成本下降了 80%。而中国光伏大会传出的信息显示，光伏组件度电成本从 2011 年的 1.32 元降到 2016 年的 0.41 元用了 5 年，到 2017 年底，这个成本将有望降到 0.29 元。

按照光伏业内的预测，到 2020 年，中国的光伏发电成本将可以降到 0.4 元每千瓦时，与核电持平，2025 年左右将可以降到 0.3 元每千瓦时，跟火电持平。这将成为新能源革命脱离政策补贴，大规模进入家庭的里程碑式拐点。

另一方面，中国也推动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2015 年，全球卖出了 50 万辆新能源车，其中 33 万辆在中国，2016 年中国卖出的新能源车将达到 45 万辆，2017 年预计将达到 58

万辆。按照高层的规划，这个飞速增长的数字到 2025 年将增长到 500 万辆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动汽车网络。

能源是工业之母，长期以来，能源效率的进步一直是由新化石能源的发现来决定，但是今天，这股力量的驱动力落到了科技公司的手中，并且在中国的强力补贴政策作用下加速。如果十年之内，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真的能够如期降到化石能源之下，今日的一切付出，都将值得。

交通

高铁革命已经完成，当下的故事是地铁革命。

中国人太多，当超过六成人口都拥挤在城市里的时候，提升交通效率的唯一办法就是修地铁。以珠三角里的二线城市佛山为例子，截至目前只有一条 21 公里的地铁在运营，但是根据最新规划方案，未来五年间开建的地铁线路将有 13 条，总运营长度将延长至 562 公里。他们和广州的 22 条线路连接起来，形成一张 1200 公里的地铁网络。

这只是中国地铁热潮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几乎每一个一、二、三线城市都制定了宏大的地铁线路规划图。比如杭州，预计五年后亚运会召开的时候，地铁站点数将从目前的五十多个增长至 150 个，比如郑州，目前运营的地铁里程只有 46 公里，而到了 2020 年，这个数字将增长到 504 公里。

按照发改委的数据，目前全国已有 43 个城市的地铁规划获得批复，规划总里程约 8600 公里。以平均每公里 7 亿元计算，总投资约为 6 万亿元。作为城市的毛细血管，地铁对经济效率的提升至关重要，6 万亿元的投入未来换回的将是不亚于十倍的产出。

制造

中国制造业的三大战役，正在进入高潮。

第一场战役，是为智能手机战，从“中华酷联”老四家，到“OPPO、VIVO、华为、小米”的新四家，期间城头变幻大王旗，跌宕起伏的故事足以流传后世。目前的竞争已进入决赛点，从收复失地到反攻海外，势头正旺。



第二场战役，是为半导体之战。2016 至 2017 年间，全球新建的十几座半导体工厂，其中大半都落成在中国。他们包括，总投资 1600 亿元的武汉长江存储芯片厂，一期投资 370 亿元的福建晋华存储芯片厂，总投资 494 亿元的合肥兆易创新存储芯片厂，总投资 387 亿元的上海华虹 12 英寸芯片厂，还有以京东方、华星光电为代表的液晶屏幕制造厂，他们的上万亿元投资都将在 2018 年前后放量。

第三场战役，是为大飞机之战。国产大飞机 C919 预计 2017 年初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这架飞机本身的产量规模有限，但是其背后折射的，其实是整个国产军工业的技术能力升级，比如大型运输机、五代隐形战机、预警机、载人飞船、空间站、航空母舰等等。

2017 年，华为和 OPPO 将大规模进入美国市场，国产半导体和液晶厂陆续落成量产，国产大飞机和航空母舰出世，这注定将是中国制造业升级的一个标志性年份。

总结

回顾过去的五年，受困于需求端 90 后出生人口，尤其是 1991 年的“断崖式下跌”，廉价日用品的消费萎缩让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阶段。当这个群体结婚买房，中国经济即将迎来最后一跌。

最令人绝望的时间段，很可能是明年年中，因为房地产的淡季通常是春节与盛夏。自 2012 年以来，每一年的六、七月份几乎都会迎来一轮大跌，或是全年股市的谷底，等待牛市盛宴的开启。

这一场旧经济的绝地，市场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瘦身应战。更重要的是，转型五年，新经济的春芽已破土含苞，就等着想象力的翅膀展开了。

（扑克投资家 2016-12-12 君临团队）

“为什么没有人对李亿龙说不”

衡阳样本：三任市委书记连续落马



2014年，衡阳市委书记李亿龙（右）到企业调研。（资料图/图）

知情人士介绍，李亿龙一到衡阳就成立了一个调查组，专门搜集张文雄在衡阳期间的问题。

“你要说童名谦是个坏人，我肯定不同意。”衡阳市委一名副处级官员说。在她眼里，童名谦就是一个糊涂官。

一个地方连续数任市委书记落马，非衡阳独有。

“在衡阳，没有人敢不听李亿龙的。通过贿选案，他处分了一大批衡阳干部，又提拔了一大批顺从他的干部。”

2008年3月至2016年3月，整整8年的时间里，衡阳换了3任市委书记，他们分别是张文雄、童名谦和李亿龙。如今，这三人已全部落马。

把视角聚焦在衡阳，不难发现：官员与局部政治生态相互影响的表象背后隐藏的是一个老话题——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

“救火”书记生活糜烂

“大家都知道李亿龙到衡阳来是救火的，但没想到他更坏。”2016年12月8日，衡阳市一名副处级官员在市委大院内的办公室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李亿龙到衡阳要“救”的“火”，是指2013年该市发生的人大贿选案。在当地，这场举国震惊的贿选案被称为“409案”。

2012年12月28日至2013年1月3日，衡阳市召开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共有56名当选的湖南省人大代表存在送钱拉票的行为，涉案金额达1.1亿余元人民币，有518名衡阳市人大代表和68名工作人员收受钱物。

彼时，担任衡阳市委书记的是童名谦。2013年12月18日，中纪委发布消息，童名谦接受调查。事后中纪委通报称，童名谦在任湖南省衡阳市委书记期间，作为市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严肃换届纪律第一责任人，不正确履行职责，对衡阳市人大选举湖南省人大代表前后暴露出的贿选问题，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严肃查处，导致发生严重的以贿赂手段破坏选举的违纪违法案件，政治影响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2014年8月1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玩忽职守罪判处童名谦有期徒刑五年。

2013年3月，贿选案发，在怀化已经当了五年多市委书记的李亿龙在57岁高龄时被调赴衡阳救火。在怀化任职期间，李亿龙以强势著称，对此湖南人用“霸蛮”这样一个方言描述他。

未料2016年11月23日，湖南省纪委发布消息：经查，李亿龙违反政治纪律，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且采取与他人串供、退赃等方式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贪图享乐，在生活上搞特殊化，长期使用公款雇用专职保姆为其提供生活服务；违反组织纪律，独断专行，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其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违反廉洁纪律，收受礼金，

用公款支付个人费用；违反生活纪律，道德沦丧，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系，搞权色、钱色交易；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滥用职权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李亿龙生活上非常糜烂，不是一般的烂。”衡阳市政府机构的一名副职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落马前，网络上曾爆出李亿龙情妇艳照，李矢口否认。

“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李亿龙只交代了与多名女性不正当关系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拒不交代。这一点倒是与他的性格相符。”一名熟悉衡阳官场的知情人土称。

多个湖南政界的信源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李亿龙被湖南省纪委带走的当天，衡阳下辖的县级市耒阳市市长刘革生为送别已不再担任市委书记的李亿龙，上门送了5万元钱。当时李亿龙不在家，保姆代收后从中抽走了2万元，只转交给李亿龙3万元。李亿龙被带走时，这3万元钱被现场查获。目前，刘革生已经被免去市长职务。

暗查并检举前任

临危受命的“救火官员”一般都会被重用或者提拔。

2014年8月，山西塌方式腐败后多名官员入晋“救火”。

从中纪委调任山西担任省纪委书记的黄晓薇，目前已担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从重庆调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的吴政隆，已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从北京市平谷区委书记调任大同市委书记的张吉福，已跻身山西省委常委。从中纪委案件一室调任山西省纪委副书记的迟耀云被提拔担任文化部党组成员、纪检组长。

李亿龙，成为罕见的例外，而他的落马，则牵扯出了时任湖南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文雄。

两个独立的湖南政界消息源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李亿龙落马后揭发检举了张文雄，“湖南官场很多人都知道，李亿龙和张文雄是死对头。”

李亿龙与张文雄的交集，始于2006年。2006

年，已经干了3年湖南省委副秘书长的张文雄调任怀化市委书记，李亿龙则从省会长沙的市委常委、县级市浏阳市委书记调任怀化市长。蹊跷的是，张文雄在怀化只当了一年市委书记就调回了湖南省委继续担任副秘书长。

“据我所知，当时就是李亿龙把张文雄闹走的。”知情人土透露，李亿龙性格强势，而张文雄又比李亿龙年轻6岁，当时党政不和成为怀化官场公开的秘密。

2008年3月，回到省委副秘书长位置上又干了一年左右的张文雄，被调任衡阳市委书记。同一年，李亿龙出任怀化市委书记。2011年12月，张文雄被提拔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离开衡阳，童名谦接任。2013年3月，57岁的李亿龙调任衡阳市委书记，接替贿选案后离开衡阳的童名谦。

上述知情人土介绍，李亿龙一到衡阳就成立了一个调查组，专门搜集张文雄在衡阳期间的问题。

一名熟悉衡阳政界的知情人土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李亿龙到衡阳担任市委书记后，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区管委会主任曾义国找到李亿龙，想动一动。李亿龙就问曾张文雄在衡阳当书记期间的情况，曾开始大谈张文雄的政绩，李不悦。在李亿龙的引导下，曾开始谈其掌握的张文雄的一些问题，李亿龙大喜，“这就对了嘛，说，就按这个思路说下去。”

2015年4月，曾义国被调任县级市常宁市委书记。2016年4月，李亿龙落马后，6月，曾义国随即也落马。

李亿龙不仅通过下属调查政治对手，还会利用媒体人。12月13日，被羁押在衡阳看守所的前媒体人格祺伟通过其律师廖曜中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2013年4月，李亿龙到衡阳任职后5天内要求《衡阳日报》换了3个报头。衡阳市一名副厅级官员通过中间人将此事告知了他，他随后公开进行了披露。

几天后，李亿龙约他在办公室见了面，一方面说好提出可以给他衡阳宣传系统解决一个正科级待遇，一方面要求格祺伟说出背后指使者。几个月

后，在李亿龙的授意下，衡阳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了格祺伟。

“李亿龙的政治对手，也在反攻他。没有这些人在背后支持，我也不敢去搞李亿龙。”格祺伟说。2016年5月，湖南衡阳市雁峰区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格祺伟有期徒刑六年。

“不是衡阳害了他们，是他们害了衡阳”

2016年12月初，一场围绕着衡阳三任市委书记落马的争论在网络上展开。一方认为，衡阳三任书记连续落马，与衡阳一贯不良的地方政治生态有关，而衡阳官场则普遍持反对意见。

“你要说童名谦是个坏人，我肯定不同意。”衡阳市一名副处级官员说。在她眼里，童名谦就是一个糊涂官。

一名知情的衡阳官员介绍，贿选的举报材料被呈送到童名谦案头时，如果他批示严厉查处，最后他一点事都不会有。可是，他当时提出的意见是让受贿的市人大代表将钱退回去。

上述官员认为，童名谦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但缺乏决断力。面对贿选案，要是有决断力的人会去踩刹车，他却不敢，也不想去得罪人。他担心晋升时得罪人，到时候没人给他投票。

“衡阳害了我，我也害了衡阳。”童名谦在出庭受审时说。湖南省某政府机关的一名中层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童名谦的落马确实与衡阳有关。但张文雄和李亿龙，并非如此。

多名知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张文雄在官场口碑一直不错，对衡阳发展贡献也很大，但其妻涂爱芳四处打着张文雄的旗号接工程。

湖南保监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局2013年1月30日核准了涂爱芳担任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公开信息显示，涂爱芳是一家环保公司的股东。知情人士透露，涂爱芳虽然在保险公司任职，但私下里沿着张文雄的任职轨迹一路接了不少绿化和污水处理的工程，人称“涂姐”。

对于李亿龙的问题，多名受访的衡阳官员也认



为与衡阳地方政治生态关系不大。其中一名正处级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李亿龙在怀化的时候，就一直有人向中纪委、省纪委告状，省纪委查过不止一次。因为他有工作魄力，在贿选案之后把他放到衡阳，但是那些恶习他没有改，到了衡阳也一点都没收敛。”

“对于张文雄和李亿龙，不是衡阳害了他们，而是他们害了衡阳，让衡阳被污名化。”上述衡阳官员说。

曾担任黑龙江省副厅级巡视专员的李克军认为，官员出事一般是四大因素的集合：一是整个官场生态，权力运行机制不完善，缺乏有效制约，风气不正。二是局部生态，有的地方好些，有的地方差些。三是个人因素，有的严谨慎重些，有的张扬放肆些。四是偶发因素，如群体性事件引发、与某人矛盾激化、离奇事件引发关注、死磕上访或揭发者坚持不懈等等。官员落马是综合因素造成的，不能单独突出地域影响。

“要是符合组织程序，还要你组织部干什么”

一个地方连续数任市委书记落马的情况，并非衡阳独有。

根据纪检部门的通报和司法部门的司法判决，一个共同点是这些地方落马的市委书记们多数都是走到哪里贪腐到哪里，而且一边贪腐一边被提拔。

江苏省常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原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的判决中指出，其贪腐的时间从1992年到2014年，时间跨度长达22年，认定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委托他人企业经营、职务晋升、岗位调整（下转第17页）

“双创”是经济转型最大的新动能



12月10日，“财经国际论坛——变局下的包容成长”在三亚举行，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应邀出席会议并演讲。他认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中国版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伟大实践。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明确它有“三大任务”：结构优化、创新驱动、改革引领。习总书记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创新。其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靠“三大主体”，发挥人的积极性。实现改革的落地，要激发市场主体——企业家，创新主体——科研人员，改革主体——官员，这三个“关键少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重振企业家精神，激活科研人员创新精神和官员的担当敬业精神。再次，要防范认识上的“三大误区”，不能把供给和需求对立或割裂开来，供给和需求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把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西方的供给学派混为一谈；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增加供给，或者淘汰过剩产能，应该是上述“三大任务”的统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用好“三大引擎”，保持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一是“中国制造2025”，加速推动产业的升级；二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发展新动能；三是“一带一路”，通过开放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辜胜阻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有四次大的创业浪潮：第一次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城市边缘人群和农民创办乡镇企业为主要特征的“草根创业”；第二次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以体制内人群下海经商为特征的“精英创业”，包括了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的行政科研人员，当时媒体称有大量体制内的政治精英、科技精英下海经商；第三次是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风险投资及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互联网新经济为特征的创业浪潮；第四次就是当前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这一轮创业浪潮具有六大重要特征：改革、特别是简政放权的改革成为“双创”的主要推动力；创业、创新、创富成“金三角”，创业主体为创富而创业，为创业而创新；创业创新主体多元化，不仅有精英创业，也有草根创业；创业创新的形式高度互联网化；在双创中，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双创”载体呈聚合式创业创新，全国出现多个创业创新中心。

辜胜阻强调，通过“双创”培育新动能，需要营造良好创业生态，打造创业-创新-创富“金三角”和创业-创新-创投“铁三角”，实现聚合创新，要依靠大企业“裂变式”创业，建立容错机制，加强产权保护，让创新创业者有“安全感”。

首先，要形成良好的创业创新的生态系统，推进“双创”的主体多元化。创业生态系统是由创业主体、创业要素及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所构成的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动态平衡系统。实现创业主体多元化，要重视三类“回归”创业，推进草根创业与精英创业共同发展。当前，创业不仅有“洋海归”（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创新），还

有“农海归”(在沿海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回乡创业)。在金融危机后,湖北黄冈有二千多农民工回乡创业,吸纳8万多人就业。此外,还包括成功人士回归家乡创业,如近年来,浙江大力推进浙商回归创业。

二要构建创新激励机制和营造良好环境,推进创新人才的知识资本化和知识产权股份期权化,建立知识合法转化为财富的机制,实现创新、创业、创富联动,形成创新“金三角”。在创新过程中,制度创新重于技术创新,人才激励重于技术开发,营造环境重于集聚要素,作为创新“软件”的创业创新文化重于设备厂房“硬件”。因此,要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做强实体经济。

三要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双轮驱动”,打造创业、创新和创投“铁三角”。美国私募基金规模超过中国10倍,国内创投发展与国外差距较大,要通过大力发展创投鼓励更多的闲钱进入实体经济。要继续完善支持创业创新的多层次“正金字塔”型资本市场。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是市场化和法治化,要通过修改《证券法》,进一步治理资本市场欺诈发行、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市场生态。要用好“新三板”,服务创新型中小微企业。

四要推进模式创新,实现众创、众包和众筹的有效对接,推进创业创新要素聚合。要通过科技园引领新一轮要素聚合,中关村就是典型的要素聚合创新载体,具有产、学、研、用、金、介、政齐备的协同创新体系,能够吸引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资源集聚。深圳是全国创新最成功的城市,其成功原因在于深圳具有典型的移民文化,有利于孕育“敢于冒险、崇尚创新、宽容失败”的创业创新精神;形成了多元化创新创业主体的“新四军”:有海外留学归来创业的“海归系”,深圳有6万海外留学人员,还有从全国各地到深圳创富的“孔雀系”。此外,还有由深圳本地创业者形成的“深商系”和从科技大企业离职创业的“裂变系”。深圳有极具活力的创新生态圈,形成了创业,创

新,创投的“铁三角”,实现了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双轮驱动”。

五要发挥科技大企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龙头”作用,推进“裂变式”创新创业,形成顶天立地的大企业和铺天盖地的小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李克强总理讲,“双创”既是小微企业生存之路,又是大企业繁荣兴盛之道。大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能力强,研发能力高,是新创企业的“黄埔军校”,裂变出了联想系、百度系、腾讯系、华为系等创业者群体。

六要建立容错机制,培育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创业文化和价值观。创业创新面临着多重风险,需要建立容错机制为创新者保驾护航,消除创新者的后顾之忧。创业文化是创业创新活动最根本的支撑,也是继续推进创业浪潮的重要保障。要注重营造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不以成败论英雄”,从文化层面提升社会对创业者的认可和尊重。

七要完善产权保护机制,让创新创业创富者有“方向感”和“安全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对促进创业创新非常重要。要不断完善产权制度,倡导政府诚实守信,维护政策的连贯性和确定性,使创新创业创富者安心、放心和有信心开展创业创新。

最后,要避免双创过程中的“浮躁化”心态,防止创新“运动化”和盲目跟风倾向,避免创业“泡沫化”和过度炒作行为,纠正对双创“全民化”的误解,众创关键在众,但众创不是全民创业,防止“互联网+”创业的过度“网络虚拟化”以及创业教育“功利化”。通过避免这些误区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辜胜阻在总结“双创”成绩单时说,“双创”是经济转型最大的新动能,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实践。通过创业带动就业,对冲经济下行产生的就业风险,通过创新实现提质增效,推动产业升级和创新驱动。一方面,创业对于保障就业是“快变量”,大量新增市场主体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以创业带动就业是应对当前失业风险的重要

重要举措。从世界范围看，为了应对失业危机，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创业美国，英国鼓励大众创新，日本也提出要鼓励创业。统计显示，日本平均每年新创办的企业为9万家。而我国每天新创企业就有1.4万户，一周新创企业数量相当于日本一年的总和。伴随着大众创业浪潮的不断推进，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也稳定在5%左右。另一方面，通过万众创新，创造新需求，实现新供给，培养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传统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据统

计，2016前三季度，国内发明专利增长44%，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三新”经济增加值已超过GDP的15%。同时，创业与创新是一对“孪生兄弟”，通过创业与创新的联动，将使技术创新等成果顺利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未来，为了更好地发挥双创作为经济新动能的重要作用，政府要进一步营造良好发展环境，让初创企业不仅要“生得快”，更要“活得好”，“活得长”。

近两年来，辜胜阻对20多个城市数百家企业和“双创”平台进行了“双创”调研。

(2016-12-14 中国政府网 郑超 庄芹芹 李睿)

(上接第14页)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541.96万元。

根据司法部门公布的法律文书和纪检部门的通报统计，除申维辰外，原山西省太原市委书记聂春玉，原山西省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原安徽省淮南市委书记陈世礼、方西屏，原河南省焦作市委书记秦玉海，原河南省三门峡市委书记连子恒等，均是在多个岗位上都存在贪腐行为，一路被带病提拔，且贪腐行为多数是在担任党政一把手期间发生的。

“这不是哪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一把手权力缺乏监督的问题。”上述湖南政界的知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李亿龙落马后，湖南一位省委常委到衡阳参加衡阳市委民主生活会。会上，这位省委常委质问在场的衡阳市委常委：“为什么没有人对李亿龙说不？”这位省委常委也对衡阳市的相关部门官员进行了批评。

“在衡阳，没有人敢不听李亿龙的。通过贿选案，他处分了一大批衡阳干部，又提拔了一大批顺从他的干部。”衡阳市一名副处级官员说。

一名知情人士介绍，李亿龙在人事安排上独断专行，经常在随意安排官员时对组织部官员说：要是符合组织程序，还要你组织部干什么？

在一次外出调研的考斯特上，李亿龙要求衡阳市委组织部负责人提拔一名官员，这名负责人认为提拔该官员不符合组织程序。李亿龙当即当着一车人大声训斥该负责人：什么符合程序不符合程序，让你提拔就提拔，你不听信不信我把你免掉？

“常委会上，基本都是李亿龙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包括市长都没有什么发言权。”上述知情人士说。

监督缺失，也并非所有官员都不能洁身自好。在山西吕梁市和运城市，都曾发生连续两任市委书记落马的情况，但也有例外。2015年4月，现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时任吕梁市委书记的高卫东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他曾担任运城市委书记，后两任市委书记相继落马，到吕梁后，他的前两任吕梁市委书记相继落马。

“个人是否把持得住，成了关键。”湖南上述官员说。

李克军表示，一把手必须实现最大限度的权责对应，改变过分倚重自上而下监督，形成纪检、审计、人大、媒体立体监督体系更为重要，实现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监督才是关键。从反腐防腐制度化角度看，真正把权力关在法治笼子里才是关键。

(2016-12-16 南方周末记者 褚朝新 实习生 王露晓)

“工匠精神”何以成为年度流行语

12月14日下午,《咬文嚼字》杂志发布了“2016年十大流行语”,“洪荒之力”、“供给侧”、“蓝瘦,香菇”及“工匠精神”等入选。媒体报道,据该杂志执行主编透露,直到当天上午10点多,“葛优躺”才伴随着争议最终敲定。



图为12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代表时表示,希望他们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

既然是流行语,有争议很正常。但笔者以为,“工匠精神”的入选当无争议。因为纵观本年度,自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后,这一表述的传播效果可以说是点透了人人心中所想、几欲脱口而出的那层窗户纸,使“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两个舆论场紧密贴合。政府文件和媒体评论,专家所讲和百姓所议,乃至搜索引擎热词和商业广告语,“工匠精神”的热度几乎是全覆盖。

“工匠精神”一语流行,让人不禁感慨两点:一是“民之所望,施政所向”。从“实”的方面看,随着国内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崛起,中国制造

愈来愈让人感到痛切的一点,便是相当一部分产品的品质不够高,款式不够美。可以说,公众苦品质久矣。而品质所系,恰在工匠精神。总理适时提出,当然切中人心,年度流行也就毫不奇怪了。

从“虚”的方面看,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公众对公共管理以及政务服务等方面都有更高的期待和诉求,社会治理愈来愈要求精细化。政府对此也有所呼应。一个例子是李克强要求有关部门以工匠精神操作好全面推开营改增这一减税利民的重大改革,另一个例子则是总理以上海两家小食店“点题”优化服务的工匠精神,要求带着对老百姓更多的感情进行市场监管。

第二点则是“上下同欲者胜”。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的宏观目标与微观的市场主体之间,如果说需要一座桥梁的话,当下观之,工匠精神颇适合担当此一角色。国务院今年以来就此发力,大力倡导工匠精神、推动一场品质革命,便是从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和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入手,带动整个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长远发展。

作为评选者,《咬文嚼字》杂志是这样表述的: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一词迅速流行开来,成为制造行业的热词。随后,不仅制造行业,各行各业都提倡“工匠精神”。于是,使用范围扩展,任何行业、任何人“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精神,都可称“工匠精神”。

由此观之,“工匠精神”的流行善莫大焉,它喻指着经济发展乃至社会心态的一种整体性提升。

(2016-12-15 第一财经网)

古代如何考察官德



官德,是掌握一定政治权力的公职人员的行为准则和道德素质,广义讲,包括“道”“德”“法”三要素。“道”指从政原则方法,“德”是官员德行操守,“法”是对公权力规约限制。我国古代官德扎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贯穿于官吏选拔、任免、升迁、奖惩各个环节,对德、能、勤、绩、廉全面涵盖,内涵丰富、意义深刻,具有重要思想价值。

中国从古至今就重视官德,强调官德在治国理政中的主导作用。从政者把正心、修身、立德作为入仕根本,推崇“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的官德箴言。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讲:“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这里强调德的重要性,如不能选用圣人、君子,那宁可启用资质平庸之人,也绝不用德行有亏的小人。南宋吕本中所著《官箴》被后世奉为做官必读书目。书中提出:“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简言之,只要遵守清廉、谨慎、勤勉这三法则,就可保住官位、远离耻辱、得到上司赏识、得到下属拥戴。这既反映了古代为官者道德修养和素质要求,也成为从政者持守官德行为规范。

官德之所以从古至今被高度重视,与它的价值及影响密不可分。一方面,官德对政令法规运转执行和贯彻落实有重要影响。当权者要确立政治权威,实现治国理政构想,就要以自身德行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取信于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

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另一方面,官德对政治生态乃至社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上行则下效,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孔子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统治者德行像风一样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官德不仅事关执政者安身立命之基,更关乎民风、国风。因此,历代统治者在吏治改革与建设过程中,都把官德当作任用、考评官吏头等大事,通过不断完善官德考课制度,实施赏罚奖惩办法,强化官吏队伍建设。

虽然历朝历代对官员考评内容和标准各有侧重,但以德服众、以德统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以及公、善、慎、廉的道德规范始终是不变核心。

中国从黄帝开始,有“百官”设置,西周时期建立官吏考核制度,到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再经汉唐、明清数千年演进,最终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相对成熟的官吏考课制度。

据史籍记载,西周“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即每三年对官员进行一次全面考核,以考察官德为首,兼顾政绩才能。考核方式是“六计课群吏”,即《周礼》的“六廉”:“一曰廉善(是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的好评);二曰廉能(是指能较好地贯彻落实各项政令);三曰廉敬(是指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四曰廉正(是指品行端正,廉洁自律);五曰廉法(是指明法懂法,严格执法,模范守法);六曰廉辩(是指遇事头脑清晰,不疑惑)。”“六计”以“廉善”为首,“廉善”“廉敬”“廉正”是考核官德,“廉能”“廉法”“廉辩”是考察才能。西周考评官吏坚持崇善重德、兼顾政绩,不仅为中国古代官员从政做官确立了基本行为准则,



也为古代官员考核建立了主体框架,对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产生深远影响,被历代统治者沿袭承继,成为任免、评价官吏主要依据和参考标准。

秦朝全面继承法家主张,即“明主治吏不治民”,坚持贯彻法家“严于治吏”原则,《为吏之道》《除吏律》《仓律》《田律》等法规中对官吏任用、考核、职责都有详尽规定。秦考核官德推崇“五善”。《为吏之道》载:“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这里强调官吏应廉洁自律,要严格按法律办事,不徇私情,不为人情所阻,要为人正派,胸怀正气,为民表率。

汉代开始力推“德政”。从汉武帝起,选拔、考核官员主要用三种方式:分别是“贤良方正”之士在皇帝前建言献策;各地以“察举制度”选拔孝、廉之士;征召社会名望较高贤达之士担任官职。这些选拔考察方式,一方面看重官员个人才华,另一方面更加注重考察官员德行。到了汉元帝,从永光元年开始,“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这就是汉代著名的“光禄四行”选拔考核办法,这一标准涵盖“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等道德行为规范,以此四行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标准。通过此法负责选任、考核的官员,每年对官吏以“光禄四行”为标准进行官德考核。在考核办法上,主要通过自上而下察访、巡察方式,对官员德行进行全方位考核、评估,酌情予以奖惩。

魏晋时期,在继承两汉官德考核制度基础上,实行“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负责察访、考评官员德行,定出“品”和“状”。考核体系中,共分九个品级,每一品都有对应“状”,即道德评语,比如“天下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

在“九品中正制”中,有一套较完备的官德考核标准,即“中正六条”,《晋书·武帝纪》载:“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絜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到了唐朝,对官员考核已形成一套制度,《旧唐书·职官志》概括为“凡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四才指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辩正)、书(楷法遒美)、判(文进优长);三实包括德、行、才。考核后,“较之优劣而定其留放,所以正权衡,明与夺,抑贪冒,进贤能”。根据考核结果,对官员实行奖赏、贬斥或废黜。在唐代,官德考察标准逐渐发展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根据各部门职责,分为二十七类,每一类再定制符合职位要求的考核标准。

明朝制定了一套完备的官吏考课制度,这和朱元璋治吏理念有极大关系。他认为“任官之法,考课为重”,如果对官员贤能与否不进行合理奖惩,就难以实现善治。官员考核有“考满”法,即官员任职满三年,参加初考,满六年叫再考,九年则叫通考。考核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考核结果“平常”及以上,予以提拔。除了“考满”法之外,还有“考察”法,对在京官员,六年一考察,叫京察;京外官员,三年一考察,叫外察。同时,外官三年一朝觐,也叫朝觐考察。考察标准有八条:一贪、二酷、三浮躁、四不及、五老、六病、七疲、八不谨。在上述例行定期考核制度外,又发展出“随事考察”“访察告诫”等考课方式,对官员德行、政绩进行全面评定,予以奖惩。到了清代,官德考核大体沿袭明朝做法,结合时代特点加以完善,形成相对成熟的考核制度。

从历朝历代官德考核要求可以看出,古代官德思想以儒家“德治”思想为核心,考核标准从宽泛笼统发展到精准明确,考核办法从简单粗放走向科学、专业、规范,成为提高政权组织和运行效能的重要保障。(2016-08-03《群众·决策资讯》刘海建)